

文化、技术与 企业制度变迁

WENHUA JISHU

YU QIYE ZHIDU BIANQIAN

郭冠清 ·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本书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
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批准号[05AJL001]的资助



郭冠清 著

文化、 技术与 企业制度变迁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技术与企业制度变迁/郭冠清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10

ISBN 7-5017-7803-5

I. 文... II. 郭... III. 企业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究 IV. F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7956 号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出版社(100037·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彭彩霞(电话:010—68354371;email:winterpeng@126.com)

责任印制:张江虹

封面设计:红色方块封面设计/谭雄军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张:20.25 字数:290千字

版 次:2006年10月第1版

印次: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7-7803-5/ F·6809

定价:3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68359418 6831928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本书谨献给：

**为了家庭兴旺呕心沥血直至
献出年轻生命的兄长郭书
廷，以及为了人类进步牺牲个
人幸福甚至生命的人们！**

序 言

尽管作者对企业的兴趣可以追溯到 12 年前离开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投身商海的那段难忘的经历,但是真正的理论研究却是始于 6 年前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虽然在企业工作期间,对计算机科学的痴迷研究,使作者真正感受到什么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是,由于被亚当·斯密、李斯特和马克思等牺牲个人幸福、献身人类进步的经济学家的大品格所折服,作者还是投身到经济学研究之中。自然,基于商海实践的经历,也就选择了企业领域。本书应该说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的一个阶段性总结。虽然 6 年的时间不算太短暂,但是由于作者才疏学浅,估计对企业的研究将延续到生命的终点,因此,如果在后续的研究中,理论观点有些变化,我想那是作者坚定不移地贯彻作为本书研究起点的“科学的态度”从事研究的结果,绝不是来源于政治风向的变化和权威的挑战。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宽松的研究环境为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

本书要探讨的是企业制度变迁的规律,因此,一切关于企业和制度的研究成果都应该成为本书的理论来源,但是由于时间和研究范围的限制,作者将研究企业和制度方面最具代表性又存在对立性的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本书的主要理论来源,当然,本书许多内容离不开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思路、马克斯·韦伯对文化的研究等。应该强调的是,本书中使用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因此,在本书中作者试图摘掉库恩的“有色眼镜”,对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研究纲领进行重新解读,放弃了如辩证唯物主义等作者认为非马克思本身的东西,同时在附件中列举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研究对象重新解读的研究成果。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本书的主要理论来源之

一,因此,尽管这些内容可能受到“教旨主义”和“反传统主义”的批评,但是作者还是将其保留在书中。可能在很多人看来,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列宁和斯大林的部分也许称不上为著作的书籍,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在作者看来,这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研究经历。

虽然对企业制度变迁的研究已有发人深省的阐述,并且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分析工具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力工具研究企业的著述很多,但是,利用制度分析的逻辑,将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企业制度变迁的著述尚未看到,本书第1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个尝试。本篇首先对人性行为假说作了探讨,在试图给“经济人”假说一个客观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人”假说,然后从两个层面对企业制度变迁的规律进行了探讨。第一个层面是从效率和效益的分析入手,利用社会生产力和交易成本两个工具,探讨了企业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的决定因素;第二个层面是寻找企业制度变迁的背后原因,在假定企业制度以外的制度为外生变量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文化和技术对企业制度变迁的影响。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以文化和技术为内生变量,构建了一个企业制度变迁的分析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对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规模和企业制度变迁进行了分析。由于数学模型在表述思想时具有简洁易实证分析等优势,因此,在本篇中使用了不少数学模型,这对于没有学过高等数学的读者可能有些困难,不过略去这些模型并不影响对本书关键内容的掌握。本书已将文化因素对企业制度变迁影响计量分析的研究成果放在了附件,以减少阅读本书的困难。

要对企业制度变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仅提出一套理论或假设是不够的,实证的检验也很重要,本书第2篇试图完成这个工作。在这篇中,首先沿着历史的顺序,考察了家庭组织以及与家庭组织相关的组织起源、市场组织以及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市场模式的产生,并在其基础上考察了企业制度初级形态工场手工业和企业制度的典型形态工厂制度的产生;接着对企业制度诱致性变迁的两种主要制度形式即合作制企业和股份制企业进行了考察,不仅考察了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而且对其作用和局限性进

行了分析;然后对企业制度强制性变迁的制度形式即国有企业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这里的考察不仅包含了对西方国有企业和我国国有企业的变迁过程的考察,而且也包含了对具有可借鉴意义的日本国有企业“三起三落”的历史考察;本篇的最后是对企业制度在当今的渗透与发展的考察,重点考察了知识进步引发的管理革命而导致的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以及知识进步引发或即将引发的知识革命而导致的学习型组织的出现。通过实证的考察,得出了基于本书的企业制度综合分析框架既能对企业制度形成与演变的历史作出解释,也能对企业制度的现在和将来作出较好预测的结论。

通过上述的理论探讨和实证考察,本书试图回答一个科斯以后还在困扰经济学界的重要问题,即: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从一种制度形态变迁到另一种制度形态?企业的有效边界在哪里?同时也试图对企业制度变迁背后的关键因素给予解释。

本书是作者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延续,毫无疑问,它凝聚了我的博士生导师吴易风先生和已逝的杨德明先生的不少心血,也离不开博士后导师刘树成研究员、左大培研究员和杨春学研究员的精心指导。几位导师卓越的见识、开放的学风和严谨的态度,为我一生的研究树立了榜样,在此谨表示深深的感激!本书的完成离不开朱玲研究员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指导与帮助、离不开张平研究员、赵志君研究员、徐霞辉研究员、魏众研究员、张晓晶研究员、姚宇博士等日常的指导和帮助。他们严谨的学风、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见解,给作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本书在文化研究方面,与秦皇岛市委书记王三堂、河南省委副秘书长王群博士等进行过多次有益的探讨。本书在企业实际调查中,得到了漯河市市长靳克文、邯郸市委书记聂辰席、衡水市市长冀纯堂、河北省环保局局长姬振海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本书的部分内容得到了王振中研究员、高鸿业教授、胡代光教授、刘凤良教授、钱津研究员、刘元春教授、丁冰教授等的指导与帮助。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本书的写作得到我的妻子赵立秋女士的大力支持,她不仅承担了全部家务和事务工作,而且,对作者从事理论研究给予了很深的理解和精神的支

持。当然,本书的写作如果没有岳父赵兴全先生、岳母李静女士,以及我的兄长郭冠华等家人的支持,也是很难完成的。同时,本书的完成离不开姜松、薛冰、付虹蛟、白文静、吕辉、曹慧敏、孙佳等在资料收集和论文修改方面给予的帮助。自然,如果没有中国经济出版社毛增余副总编的支持,本书是无法面见读者的。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是在我尊敬的兄长郭书廷一周年祭日之际完成的,那一刻,心中有说不出的伤感,既有对兄长离世之际没在身旁的愧疚,也有对兄长浓浓的思念之情。不过,唯一让我欣慰的是,我终于按约定时间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尽管本书“既缺乏能规范思维的理论体系,又没有能高瞻远瞩的济世良策”,尽管书中存在着许许多多连自己都不能满意的遗憾。

最后,再次感谢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亲人和朋友们!

2006 年 9 月 20 号

于上地西里



目 录

1 导论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科学的态度:理论研究出发点	/2
1.3 范式和研究纲领	/6
1.4 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研究纲领	/13
1.5 文献综述	/35

第 1 篇 企业制度变迁的微观基础

2 “实践人”假说	67
2.1 “经济人”假说及其相关的研究	/67
2.2 “经济人”假说的最新研究进展	/69
2.3 “实践人”假说	/71
2.4 关于人性行为假定的进一步说明	/74

3 企业制度变迁的逻辑	75
3.1 制度的逻辑	/75
3.2 制度需求:交易成本的作用	/78
3.3 制度需求:生产力的作用	/83
3.4 制度供给:政府的作用	/87
3.5 影响企业制度变迁的其他因素	/89

4	技术进步对企业制度的影响	92
4.1	技术与制度	/92
4.2	技术进步带来生产可能集扩大	/94
4.3	技术进步带来规模经济	/95
4.4	技术进步对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影响	/99
4.5	信息技术对企业规模的影响	/103
4.6	技术进步与企业制度变迁	/104
5	文化因素对企业制度的影响	107
5.1	已有研究状况	/107
5.2	文化维度与文化模式	/112
5.3	价值模式对企业制度的影响	/115
5.4	伦理模式对企业制度的影响	/123
5.5	其他文化因素对企业制度的影响	/129
6	企业制度变迁模型	131
6.1	模型的建立	/131
6.2	关于模型的说明	/132
6.3	企业的性质	/133
6.4	企业制度的变迁	/133
6.5	企业的规模	/134
6.6	文化、技术与企业制度变迁	/135

第2篇 企业制度变迁的实证考察

7	企业制度的起源	140
7.1	家庭及相关组织	/140
7.2	市场组织和市场模式	/143

7.3 工场手工业和工厂	/145
8 企业制度的诱致性变迁	152
8.1 合作制企业的尝试	/152
8.2 股份制企业的发展	/155
9 企业制度的强制性变迁	159
9.1 西方国有企业发展的历程	/159
9.2 我国官营组织和国有企业的演变	/161
9.3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	/164
9.4 日本国有企业的“三起三落”	/168
10 企业制度的渗透与发展	170
10.1 知识、生产力与企业制度	/170
10.2 管理革命: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	/175
10.3 知识革命:学习型组织的出现	/180
结束语	189
参考文献	191
附 录	234
1 企业性质的综合分析框架	/234
2 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研究	/260
3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解读	/279
4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重新解读	/294

1 导论

或许是因为企业制度对社会发展过分重要的原因吧,一旦走进企业制度的研究之中,我们常常会陷入卢卡斯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尽管理论的研究并不一定能收获丰硕的果实,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停止研究的进程。本书结合文化和技术的研究提出的企业制度变迁理论,充其量只是一个对企业理论探讨的开始而已。

1.1 问题的提出

多年以来,关于企业制度变迁的问题一直困惑着我们。无论是对被许多人视为圣经的马克思经典著作的重新研究,还是对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企业理论的深入学习,都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从被“苏联模式”庸俗化了的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Kane,1991;郭冠清,2003),到以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North,1984,1994;North & Thomas,1973;诺思,1981;拉坦,1994)为代表的“制度决定论”,再到被歪曲了的马克斯·韦伯的“文化决定论”(Kane,1991;Davies,1992;Delacroix & Nieleesen,2001;Franke,Hofstede & Bond,1991;韦伯,1958),不同学派处于研究的偏爱等原因,对经济发展(自然包括企业的发展)给予了不同的回答。对有关这些文献的阅读和思考,虽然给研究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和不小的难度,但是也增加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为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本书关于企业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尽管“科学的态度”作为信条一直贯穿于自己心中,但是由于在研究时无意识的“思维锁定”,加上马克思著作的博

大精深,诺思实证的充分有力,以及韦伯见解的深邃透彻,而常常致使科学的诚实让位于盲目的信仰,理论的研究夹杂进许多主观的偏见,于是,试图摘掉库恩“有色眼镜”(Kuhn,1962)的尝试很可能变成了南柯一梦。幸运的是,尽管经过多年的迷茫,但是,最后还是提出了自己对企业制度变迁的初步理解,并试图通过对企业制度变迁的原因,以及原因背后的决定因素探讨,回答一个科斯(Coase,1937,1960,1992)以后还在困扰经济学界的重要问题,即: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从一种制度形态变迁到另一种制度形态?企业的有效边界在哪里?本书的结论是企业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企业与其他契约结构相比在成本方面(主要是生产成本)具有了比较优势;企业制度的变迁来源于“实践人”基于对利润的追求,诱致创新的能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契约结构;企业的效率边界处在“在企业内组织一笔交易的边际交易成本与节约的边际生产成本之差等于在其他企业内组织一笔交易的边际交易成本与节约的边际生产成本之差或市场内组织一笔交易的边际交易成本时”为止。上述结论的得出离不开文化和技术这两个关键因素。

1.2 科学的态度:理论研究出发点

由于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在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站在特定的利益阶层的立场(吴易风,1996c)^①,而这样一来,我们就很难站在公正的立场去看待人类社会已产生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一旦我们的思维锁定在一种理论之后,我们就像戴上了“有色眼镜”(Kuhn,1962)^②,科学的诚实常常会让位于盲目的信仰。长期以来,发生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关于西方经济学、马克

^① 吴易风教授(1996c)在《经济学家为什么不能“团结在一个旗帜下”》一文中,对此作了论证。类似的文章可参阅崔之元(1995)的《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一文。

^② 库恩(Kuhn,1962)认为,持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家戴着不同颜色的眼镜看待世界,因而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库恩通过塔式心理学的“鸭兔实验”论证他的论点。当两个具有不同心理条件的观察者观察一张似鸭非鸭、似兔非兔的图案的时候,接受“鸭”训练的观察者认定图案是鸭,接受“兔”训练的观察者认定图案是兔。库恩的“鸭兔实验”尽管具有唯心主义色彩,驳斥并无困难,但是它的寓意是深刻的。

思主义经济学之争即是很好的例证。

1.2.1 反传统主义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真的过时了吗

在我国,一些学者由于较早学习和接受了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视而不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过时,无需研究就应该抛弃,而相反,却把西方经济学看作是“100 多年来人类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樊纲,1995a)^①。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妨称之为“反传统主义”)大多数是青年学者,也有一定数量的中老年学者,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用“西方经济学”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正统位置。对此,我国一些学者如吴易风教授(1996a)、奚兆永(1999)、杨永华(1996)等作了抵制和批判。以下事例值得反传统主义认真思考。

事例之一:在千年交替之际,马克思在英国 BBC 组织的互联网上评选中,以遥遥领先的票数获得“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而参加投票者大多来自西方知名学者和民众(靳辉明,2000)。

事例之二:在 BBC 评选之际,路透社从世界各国邀请政界、商界、艺术界和学术界的 34 位名人进行“千年风云人物”评选,马克思仅以一分之差而屈居于爱因斯坦之后,名列第二(卫兴华,2000)。

事例之三: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陷于低潮,在一些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离开马克思主义之际,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四大思想家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吉登斯却不约而同地走近马克思(陈学明、马拥军,2001)。

事例之四:在新千年来临之际,伦敦为纪念马克思,耗资 56 万美元将马克思纪念馆翻修一新。该图书馆长期会员、英国执政党工党议员托尼本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是正确的,我认为他将在 21 世纪成为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卫兴华,2000)。

毋需再列举过多事例,以上事例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过时的判断缺乏

^① 樊纲(1995a)在《“苏联范式”批判》中把人们没有利用“100 多年来人类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归结为“由于最初人们对现代经济学本身不了解,掌握的还不够多、不够全面,特别是还不能正确娴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得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说服力。我国一些学者,之所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已过时的结论,往往是因为这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学者没有读过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也有小部分带着“有色眼镜”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误认为西方经济学代表着人类优秀成果。

1.2.2 教旨主义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真的穷尽了一切真理吗?

与反传统主义相反,我国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穷尽了一切真理的科学,而相反,将西方经济学看作是完全庸俗的东西。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妨称之为“教旨主义”)往往是中老年学者,也有少量的青年学者。以下问题也值得教旨主义者思考。

问题之一:当我们在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欢呼之余,是否会反思:为什么上述评选来自于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异端的国度?如果这种评选发生在像中国这样的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其结果会是如何?

问题之二:当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视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张旭,2000)^①,并以绝对终极的真理出现在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等社会科学的时候,我们在感叹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之余,是否会反思: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已被许多学者视为“日益成为一种‘封闭的’,不接受新思想、新观点的理论体系,从而越来越难以发展、越来越脱离现实,无法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理论”(樊纲,1995a)?难道马克思主义真的成了退化的研究纲领(Lakatos,1978)^②?

① 张旭(2000)的观点为代表观点。许多学者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将与其不同的观点视为庸俗或修正。

② 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是后文将论述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拉卡托斯(1978)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退化的研究纲领,他写道:“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适应已知的事实才构造出来。例如,马克思主义可曾成功地预测过新颖事实没有?从来没有,它只有一些著名的失败的预测”。后文将在应用部分批驳拉卡托斯结论。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怀疑角度看,樊纲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樊纲的本意并非如此(参见吴易风教授(1996a)的《两种“范式危机”论》一文)。

问题之三:当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对马克思主义重新作出解释或进行理论创造从而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我们在感叹领袖伟大的同时,是否会反思:为什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总是国家的元首,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总是学术工作者甚至社会科学献身者,难道学术工作者只能是庸俗者、修正主义者或者追随信徒吗?陈四益(2002)在《谁懂得最多》一文中颇具讽刺意味地描写了“以吏为师”的现状。张维迎(2002)在《私下吐真言,公开说假话》一文中对学术界说套话、假话,成为政策附庸的现状作了分析,他写道:“仔细分析,你会发现,经济学家的观点变了,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变了,主导意识形态的提前变了。他们先说当时在政治上正确的话,所以他们永远正确”^①。

问题之四:既然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无比优越,我们有伟大的党和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思想,那么为什么苏欧会剧变?难道偶然性背后没有隐藏的必然性吗?

以上问题值得每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者反思。我国一些学者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真理的终极者,而看不到西方经济学中的成果,往往是因为一方面西方经济学过多的数学运用难倒了一些早期经济理论工作者,他们很多人不要说高深的数学,就连简单的初等数学知识也不具备;另一方面,由于确信马克思主义正确性,在批判借鉴西方经济学优秀成果的时候,往往看不到真正有用的东西,结果以“庸俗”的评价给西方经济学判了“死刑”。

1.2.3 从“思维锁定”中走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

当我们怀着一颗痛苦不安的心重新审视我们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乃至对社会科学应持的态度进行反思的时候,“思维锁定”、“认知限制”等导致的“路径依赖”使我们的学术研究走向了“奴役之路”,长期的信仰(甚至从孩

^① 张维迎在该文中将这种现象称为“囚徒困境”,因为尽管所有人说真话与所有人说假话比是一个帕累托改进,但说假话是每个人的最优策略。

子时期被灌输的教育)使我们坚信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认为我们的工作才是科学的工作^①。

当科学的诚实使我们怀疑我们的信仰,甚至怀疑我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否是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学术观点的前后不一致,过去所谓研究成果的废弃,过去信仰之感受等均使我们回到原始的信仰,这一点就如同托尔斯泰(1989)《复活》中的马斯洛娃见到涅赫柳多夫感受一样,于是我们可以将与我们的信仰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一致,甚至怀疑的学术探讨者视为庸俗。而当我们一旦冲破思维枷锁,从“认知刚性”中走出,我们才会发现“牛顿通过事实的证明已经揭示出了上帝的最终定律”的信仰不过是乌托邦(拉卡托斯,1978),斯大林给我们先入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而已,错误并不来源于理论本身,而是来源于这个解释权一旦被最高统治者掌握而很难改变,对此汪丁丁(1994)在《“主义”与“科学”》一文中写道:“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社会的科学是没有生命力的”^②。

在本书中,作者试图摆脱已有观点的限制,已有“思维模式”的限制,用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审视西方学术界一百余年的学术成果,重新研究西方的经典理论,力争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力争用人类已有的成果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尽管作者知道这是一件巨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也不是本书范围所能及的。

1.3 范式和研究纲领

在开始理论研究之前,除了需要确定对待社会科学的态度外,往往会遇到范式的选择和研究纲领确定的问题,为此对范式和研究纲领的理论及本

① “思维锁定”和“认知限制”借用了行为科学、管理学上的术语,“奴役之路”借用了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的名字,“路径依赖”借用了诺恩《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的术语(当然这并非表示作者认同哈耶克、诺恩的观点)。

② 除该文外,汪丁丁还在《乌托邦与传统——永远的徘徊》(1995)、《在历史中阐述,在阐述中创新》(1996)等文中发出了类似的感叹。直到最近作者才理解汪丁丁、杨瑞龙(2000)等学者“直面现象”式的研究寓意。